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再

看西方

著者 / [美] 史蒂芬·罗
译者 / 林泽铨 刘景联

100368



上海译文出版社

GJ0-03/4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再看西方

著者 / [美] 史蒂芬·罗

译者 / 林泽铨 刘景联

RB059/08



上海译文出版社

Stephen C. Rowe

REDISCOVERING THE WEST

An Inquiry into Nothingness and Relatednes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根据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译出

再看西方

[美] 史蒂芬·C·罗著

林泽铨 刘景联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80,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7-5327-2209-0/B·098

定价: 12.00 元

译者 的话

史蒂芬·C·罗博士是美国大河谷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我们拟将其著作《再看西方》译成中文则要回溯到两年前。1995年秋,美国联合山学院的唐纳德·霍布森博士作为访问教授前来中山大学外语学院作了题为《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的比较》的系列讲座。霍布森博士在讲座中用东西方哲学、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对人性、生死理念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宗教冲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比较,力图在东西方思想大相径庭的今天从理论上寻求不同思想、文化和宗教共存的可能性。演讲是成功的,因为演讲者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比较和评价。

听完几个星期的系列讲座后,一些对西方思想、文化感兴趣的同事继续与霍布森博士探讨有关的问题。其时,霍布森博士向我们推荐了史蒂芬·罗博士所著此书供我们参阅思索。翻阅后,我们对作者就东西方文化传统所作的客观评价以及他提出的东西

方文化互补的观点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书中,作者站在俯瞰全球现状的高度高瞻远瞩,以小心谨慎而又认真负责的精神审视和评价了人类文明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的走向。他从后现代时期西方的“现代文明”及其理性主义倾向切入,分析了心体二元论的基本假设,指出了物质消费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已从西方向全球蔓延并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这种后现代时期的西方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导致了两个极端倾向:一是某些人只看到西方文明,因而将其他的文明一概作为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加以排斥。这种价值观念带来了种种的社会流弊:物质至上、享乐主义、人性丧失、道德颓败、精神空虚、信仰匮乏、人与自然对立和冲突、人际关系疏远和冷漠。二是一些人在寻求解决这些后现代时期社会问题时又往往走向对各种“非现代的东西的拥抱”,或倒退到对旧传统、旧文化的全面肯定,或转化为愤世嫉俗的逆反心理,或转向无可奈何的相对主义,或对各种社会流弊麻木不仁,放弃了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在寻求解决后现代时期西方社会问题的途径中,部分西方学者转向东方,尤其是东方的禅学,企图从中寻找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和途径。在他们的转向过程中,又有不少人陷入另一种

极端:把禅学理想化、诗意化、浪漫化,毫无批判地加以宣扬,试图借此否定西方文明。

作者在书中对后现代意识的积极性作了恰当的肯定,同时也对这一思潮的各种肤浅的、不负责任的倾向及行为作了批评。作者指出,一个新世界的文明意味着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和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进行复兴。作者站在西方人的角度,看到东方文化,尤其是禅学能提供一些西方文化所需的智慧源泉,能对西方文化起到补充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由于东西方文化所缺乏的东西有所不同,所以也就存在着可以进行互补的前提。他在这种意义上重新发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基督教文化把积极介入社会活动作为“自我”的体现,东方佛教徒文化把不入尘世、通过个人修炼达到空无的境界作为“自我”的实践;作者在书中探讨了两者在精神境界上的差异,断言,正是因为东西方这种在认识及实践上迥然不同的传统给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提供了通过探讨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空间和可能性。作者深信,东西方的对话能导致一个有助于化解彼此都面临着的许多思想和社会问题的精神综合体。

作者在书中向读者清晰地描绘了后现代思潮中

世界文明所面临的局势和困惑。他指出,东西方文化传统有时候相互显得很对立,但潜存于文化中的“他性”(otherness)理念能为不同文化的对话起桥梁作用。作者提倡东西方通过坦诚的交流和对话,寻求人性中“自我”的复兴,寻求人类彼此的交融。他主张进行禅学与苏格拉底—耶稣这两方面思想的分析比较研究,研究它们对问题的切入角度和深度,研究它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互补,从而探讨 21 世纪人类世界的新文化的未来。

我们赞成作者所提出的东西方应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的看法,这是以精神境界、道德修养以及理智升华来避免传统冲突的一种途径。东西方进行对话,把潜存的冲突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必须建立在对“他性”的理解上。当然,西方后现代时期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它是社会企业高度垄断,市场激烈竞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已商品化的产物。由于人类在社会里获得财富的机会非常不均等,加上宣传媒介,例如电影、电视为了迎合竞争需要经常对观众作哗众取宠的误导,更加强化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扭曲了人们传统的平和心态,把他们推上了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的冒险的道路。竞争既是社会发展的动

力,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所以,要解决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问题首先要着眼于使社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使社会结构更合理化,还要引导人们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和评价,以减少人类对各种后现代物质生活的依赖和追求,使人的思想和心灵得以净化。可惜作者很少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另外,通过寻求东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互补来解决后现代西方社会问题可谓另辟蹊径,但东方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即使从佛教的层面上探讨问题也有不同的流派。在寻求东方的智慧时作者只局限于日本的禅宗,而极少提及其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古老的中国文明和部分的优秀文化遗产面临着被抛弃、或只被作为古董来观赏的危险。在开放改革、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西方后现代的弊端也涌入了国门。作者对西方后现代思潮所作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其负面影响,更全面地看待和研究文化传统和文化交融问题。

翻译决非易事,翻译哲学及宗教方面的著作尤其如此。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不少的哲学术语,例如: survival, transformation, intellectualism, relatedness, subtradition, post-liberal liberalism, the origi-

nal self in itself……等等,它们在上下文的理解中并不难,但却很难贴切地译成另一种文字。这些术语虽然已根据我们的理解译成中文,但说实在的,它们可能还有更佳的译法。原文有些句子寓意深远,为了更好地让读者品味原意,我们特意在译文后面抄录原文。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作者及霍布森博士的关心和帮助。林泽铨在肯特州立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时,作者还专程从芝加哥赶到俄亥俄州的肯特看望他,商讨有关译事。霍布森博士亦多次与译者讨论本书的现实意义。

我们尽倾所能对译文进行过反复的推敲和修改,耗时近年才得初稿。承蒙美国大河谷州立大学哲学系倪培民教授拨冗对译文进行了认真的审校,我们不胜感激。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原作内涵深远、涉及的知识面广、逻辑性强,我们对原文理解不够透彻的地方恐仍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万毅、江立敏诸君不少的帮助和鼓励,特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译者

1997年6月

中文版作者序

与东方文化的遭遇帮助我发现西方复兴之道,这样说似乎令人奇怪。与东方的对话使我得以从中认识、欣赏西方传统中伟大的地方,并要如实地、生动具体地再现它们,而不仅仅是去思考它们。

西方传统的核心不在于堂皇的体系或理智的建构,也不在于作为分析论证的工具和技术的理智,尽管这些在被用于某一适时的目的时非常有用,但它们本身并不重要。

我发现,真正的核心在于对话本身,它是一种存在形式,一种实践,一种探寻并不断走向生命中的真正恒久的途径,而这种恒久同时就是我真正的自我。

我衷心希望本书能让东方读者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丰富宝藏;也希望本书能使中国人更深地品味到自身文化的传统内涵。

诚然,这一希望从一开始便成了出版本书中文版的动力。林泽铨教授在表示愿意翻译此书的第一封信中说道: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在历经了政治与文化的急

风骤雨之后,有许多中国年轻人如今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或是一无所知,或是怀着鄙夷心态。近年来尽管年轻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興趣似有升温,但我以为借鉴一个西方人对东方价值观所表达的思想,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不无裨益的。

这一看法非常正确,它直接印证了本书的宗旨,那就是与其他传统的对话有助于我们从它们那里获取我们所需的东西,同时又让我们认识到自己传统里的宝藏。

令我记忆尤为深刻的是,在一个初春的下午,春雨淅沥,我和倪培民教授一起讨论他对此书译文稿的修改意见。当时我们讨论到一个微妙而在文中又是至关重要的地方,彼此还开玩笑来;我们发现彼此初时的看法不一样,然而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交谈后却又发觉彼此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

不过,我们的一致不是在寻常意义上的一致。我们的一致不是消除了差异,而是在我们取得一致的时候,各自都变得更不同,变得更加完整!对我自己来说,我对自己书中的基本观点有了更深刻体会。我对此是记忆犹新的。同时我也认识到,对于儒家视关系为“平凡”和“回归”所在的观点,我有必要作更深的研究。

和林泽铨在一起时也一样,曾经有许多次我们显然是无法达成共识的,但后来又取得前所没有的共识。当林泽铨教授向我指出“翻译”其实是“对话”的同义词后,我更加留意我们自己文化中的这方面发展。例如。我注意到了伊丽莎白·K·明尼克用“翻译的艺术”来定义自由教育并以此重振自由教育。翻译在这里指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它运用一种包容的

理想,拒绝作融合或限制性的分离。相反,它是在人文科学中寻求跨越差异的、创造性的联系机会”。^① 翻译在这个完整的意义上,是有助于这种创造性、能促进人类发展的机会的艺术,这一发展也许在某些方面会把我们带到同一地方,但说来奇怪的是,这是在增强我们的差异的同时达到的一致。

因此,对于本书在中国出版,我深怀感激。我感激能使本书得以翻译的对话历史,感激我所提及的对话的种种好处!我感激我这本书被认为有足够的意义值得用中文出版,有人(日本人)曾经预言它将在东方“被发现”,然后终将会在西方被“再发现”(也许像东方的宝库在西方被发现之后,才在本土被发现一样,就像林泽铨所说的那样)。我不知道东方人对西方人宝库的兴趣是否会导致西方人对自己智慧和热情的宝库的再发现,但这无疑会是一个十分令人鼓舞的进步——甚至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进步。

我尤其要对几位人士表示我的感谢之情:

林泽铨,感谢他发现本书并发起翻译之工作。

倪培民,他是我的同事兼朋友,他为本书献出了不少时间和才智,此外还与我一道携手进行重大的探索。

刘景联,他协助林教授,靠着他出色的才能和辛勤工作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初稿。我还感激他在游览了少林寺后,对东西方的相对优点所作的反思。

美国联合山学院的唐纳德·霍布森教授,他把本书的英文版带到中国并与当地的同事分享,后来又在我和林

^① 伊丽莎白·K·明尼克:《自由教育和有利新学术的联系艺术》(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联合会,1996年),第13页。

泽铨之间担当了非常称职的沟通人。

这个世界十分脆弱,她的存在和兴盛有赖于人类的心灵善良、胸襟开阔,有赖于人类的宽宏大量。我们在本书和大家分享的是东西方相遇之道。它能重振这些十分珍贵的古老的美德,这些美德在今天已十分难得。“对话”和“翻译”意义良多,它有助于这些美德从中涌现的关系的建立。

史蒂芬·罗

美国密歇根州大河谷州立大学

1998年5月

致谢

在作此研究之前后,大河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慨然允我休假,在此谨表谢意。大学里为学之人俱能引疑发难,勤于探索,也使我感激不尽。教与学是我日常的基本工作,它的苦与乐、得与感概成为写成本书的必需前提。

在关于挑战与活力问题的谈话中,一些前辈曾给予客观的指正和鼓励:阿部正雄,特蕾莎·贝纳德斯,约翰·科布,马丁·马蒂,雅各布·内德勒曼,他们对我及我们大家尽倾所学,其高伟之论所构成的境界,均为我及本人曾与之攀谈过的大小学人所不及。

在周围,那些曾以各种谈话圈子加入这场谈话的朋友和同事使我得益良多,但此处只可略举一二,以表感谢:福里斯特·阿姆斯特朗,里凯莱·博诺,巴里·卡斯特罗,迈克尔·德怀尔德,罗纳德·恩格尔,厄休拉·富兰克林,马克·亨德森,乔恩·杰利马,杰奎琳·约翰逊,谢里尔·琼斯,拉纳·哈特曼·兰登,尼克·莱顿,莱波·劳伦,罗伯特·梅伯里,罗莎琳德·梅伯里,倪培民,丹尼尔·诺埃尔,巴巴拉·鲁斯,克里斯廷·罗,朱迪·惠普斯。

序言

I

在你面前这本书是对西方自由教育传统的一种探讨和实践。探讨的是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文化的复兴。始点是基于我们的实际状况：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摇摆不定，心内存有某种麻木现象，精神深处出现了理想和取向的空白，以致我们似乎忘记了该怎样去过一种人的生活。趁我们还没忘记复兴是我们的需要之前，我们需要复兴。

这项探讨的目标是针对一个人类发展的迫切问题，它对我们面对的现实十分重要，而且是人类走向全面成熟所必须的。我选择探讨的内容是这个时代最基本、却很少有人讨论的生活实情：即人类必须走向成熟，变得更警醒、更富同情心、更明智，懂得理智在人类生活中的恰当功用，否则就会灭亡。人类必须自觉自愿地进入这个成熟的阶段，这使这项探讨的目标主要落在实践上，落在探讨我们现在正做什么、处境怎么样，以及将会怎样等方面，而不仅仅在于我们在想什么。

这个探讨实际上是以试图吸取东方禅的传统而开始的，为的是要说明禅在今天混乱的世界中怎样可以成为复兴的宝贵资源。但在探索禅的多种可能性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对禅的了解愈深入，对于禅与目前我们在后传统时期的经验有什么联系的了解愈多，我就愈能重新发现西方传统中伟大的东西。大概古典的禅宗大师们会认可所发生于我身上的这点：接触禅的结果就是接触我自己。禅其实无非就是真实的自我。

我所发现的是一个西方人的复兴，但不是以把东方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排斥在外的方式。事实上，我发现，这种复兴西方的取向使我能比以前更诚恳、更深入地吸取东方思想的深刻内涵；这又反过来向我表明，我们从前对接触东方思想的反应是西方非理性主义的表现，也是对目前盛行的、但不符合人类精神的技术理性主义的逃避反应。

通过与禅和我们自己传统的接触，我发现了一条由西方人成为一个世界公民的途径，发现了一条取得活力的途径：这种活力被今天进行东西方对话的一些人描述为促进新的、全球性的大同的动力。我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经验是既要更加真实地回复自我，同时对他人也更开放。

因此贯穿于整本书的探讨的中心线索是探索与东方的“他性”(otherness)的接触，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恢复我们西方的完整性；同时使我们对于像禅那样的“他性”实在能够持开放的态度。对这个过程的理解可以把与“他性”的接触进一步延伸到其他方面，例如我的同胞、学生、家人、同事，以及其他文化中的更普遍的实在，乃至我们人性本身中的阴性方面——这是由我们西方传统的本质而决定的。因为这个传统的

真谛不在于某一项教条或某一种理智的形式,也不寄存于某一套信仰之中。它不存于“彼在”的事物上,不脱离我们对于完全存在的最深刻的经验。西方传统的真谛在于它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把生命力甚至神圣性置于遭遇本身的动力之上,置于对话之上,置于人与人的完整关系上,置于这种似乎前后相悖的关系上;即在对他人满腔热情的开放之中找到真实的自我。

本书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真谛,对它作出如实的解释,以获得我们能继续在地球上生存、能更完满地展现自我的能力。这个目的始终贯穿于个人异常艰辛的、自觉自愿的整个复兴活动中,就好像此刻我们——作为作者的我和作为读者的你——正在进行的那样。我想和大家共同探讨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方式,通过它复兴可以成为可能;东西方的观点奇妙互补,可成为诠释、戒规和灵感的源泉。

II

但这一切都不可能从外部达到。因而,本书只能是它要阐释的存在方式的一次实践,它必然是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项理论上的阐述。

在教授哲学和宗教中,我毕生恪守自由教育的原则。在这方面的实践中,最根本的一点是恰当地使用理智。如果不了解超出理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教育便成了无休止的智力活动,成了仅仅是把概念化的书籍一本接一本地堆积起来;教育会被错位,会陷入单纯的信息堆积以及无止境的研究上,而没有把教育理解为变化自新的追求。由于教育在本质上可以